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|  | | --- | | **陈独秀：文科学长与文学革命** | |  | | **匡双林** | |
|  |
| |  | | --- | |  | |
| |  | | --- | | 陈独秀（1879—1942），字仲甫，号实庵，安徽怀宁人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、发起者和主要旗手，“五四运动的总司令”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，著名政治家、思想家和教育家，曾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，与蔡元培一起对革新北大有过重要贡献。      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     蔡元培接过教育总长范源濂递过来的北大校长聘书，这对昔日的同事、而今的上下级都显得庄重肃穆。范源濂问：“蔡公打算从何入手？”蔡元培说：“首先网罗人才，尤其是文科人才。”范源濂说：“文科学长，既要与你蔡公志同道合，又要德高望重，还能冲锋陷阵，可不好找啊！”在场的汤尔和说：“我想到了一个人，陈仲甫，他定能担此重任。”沈尹默随声附和……      这是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里第五集中的一个场景，历史确也与此有些许相似——不同的是，沈尹默也是汤尔和推荐的。于是，有了后来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仲甫“出山”的美谈。      陈仲甫任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，全校震动，褒贬不一。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，奔走相告。北大遗老遗少，窃窃私议，啧有烦言。因为陈独秀的学问，他们看不上。但据记载，“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，态度鲜明，驳斥有力。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，学有专长，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……高一涵先生甚至说，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。这样众口一词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”。      不管怎么样，陈独秀走马上任了。      陈独秀深刻领会蔡元培办北大的方针，蔡元培也完全放权。“人事、行政，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，不稍加干涉。”革除积弊是必须做的。欲除旧，先纳新。陈独秀目光紧盯革新思想的人才，用以充实整顿教师队伍。他致函胡适：“孑民先生（蔡元培）盼足下早日回国，即不愿任学长，校中哲学、文学教授俱乏上选，足下来此亦可担任。”同年8月，胡适留美归来即任北大文科教授，陈独秀亲往火车站迎接比自己小12岁的胡适。李大钊亦进入北大，任图书馆馆长。还有，出现在《〈呐喊〉自序》中的那位金心异，也就是钱玄同，正是他奉陈独秀之命上门游说，催生了周树人一篇《狂人日记》小说，署名鲁迅，“从此一发不可收”，这个笔名从此响彻文坛，光耀千秋。后来，小说作者还应老乡蔡元培邀请，设计了一个北大的校徽，沿用至今。乃至在《我观北大》中，他不无自豪地称：“北大派么？就是北大派！怎么样呢？”鲁迅自称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个敲边鼓的角色，他的创作乃是“遵命文学”，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前驱者的命令。这“前驱者”显然不是别的什么人，而是《新青年》的主编陈独秀。      作为思想家、教育家的陈独秀，以《新青年》为阵地、以北大教师为主要作者群的文学革命，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无比深远。陈独秀高擎“文学革命”大旗，向封建文学进行抨击，为之奋不顾身，在《文学革命论》中写道：有不顾迂儒之毁誉，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？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，为之前驱。以陈独秀为核心的《新青年》作者群，大力提倡白话文，反对文言文，通过《新青年》的传播，白话文深入人心——没有陈独秀，没有胡适、鲁迅，白话文当然也会走向全国，但恐怕不会这么快。      除此之外，陈独秀着手改制北大文科。北大文科原来只有中国文学、中国哲学、中国史学和英语四门（系）。陈独秀到任后，中国文学系于散文、诗之外，增设词、曲、小说三系，并另设立哲学、中文和英文研究所，增设法、德、俄诸国文学系，以矫正偏重英语之旧习，并根据学生的外语程度，调整班级，开设新班。哲学系于中国哲学、西洋哲学外，增设印度哲学等。史学系于本国史、西洋史外，增设印度史、东洋诸国史、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美术史等课。      北大面貌，为之一新。      历史总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诡异，就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一个多月，蔡元培在汤尔和家中商量北大事宜。汤尔和“议论风生，力言（陈独秀）私德太坏”“如何作大学师表”。同样，沈尹默也投了汤尔和一票。蔡元培不得不做出撤销陈独秀文科学长的无奈之举，陈独秀以请假为由，黯然离开了北大，北大文科学长任职时间仅两年。这可真是“荐也汤尔和，去也汤尔和”……      一个月后，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北京上演了。陈独秀还有胡适虽然没有与学生一起上街游行，但他们和蔡元培一样作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，值得永远铭记。      一年后的1920年，陈独秀接到了一封来自广东的电报，发电人是广东省长陈炯明，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务（类似今之教育厅长）。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，他复信表示赞成，说：“一可以将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带到广东去，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。”确实，离开北大的陈独秀，离开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，拥抱了共产主义，于是他抵达广东后，运用共产主义理论对广东教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。      陈独秀仿老校长蔡元培，上任前向陈炯明约法三章：一是教育独立，不受行政干涉；二是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；三是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。      陈炯明同意。      陈独秀抵粤刚刚10来天，即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作了“新教育是什么”的演讲。他在演讲中说：“新教育注重改良社会，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。”同时，还提出了学科改革的主张。陈独秀相信：刷新教育，必先收罗人才，大学所在，即人才所在，故先需建设大学。除了坚持在北大时网罗人才的做法，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址上筹建广东大学，为学校创建做了很多工作——虽然广东大学宣告成立的日子，陈独秀早已不在广东了。      9个月后，陈独秀离开广东，辞去广东省的教育职务，返回上海。因为这一年的7月23日，上海的李达、李汉俊，武汉的董必武、陈潭秋，长沙的毛泽东、何叔衡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（现兴业路76号）和浙江嘉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中央局书记……      从此，陈独秀告别了讲台，以革命家、政治家的身份镌刻在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中，但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，依旧是20世纪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| |